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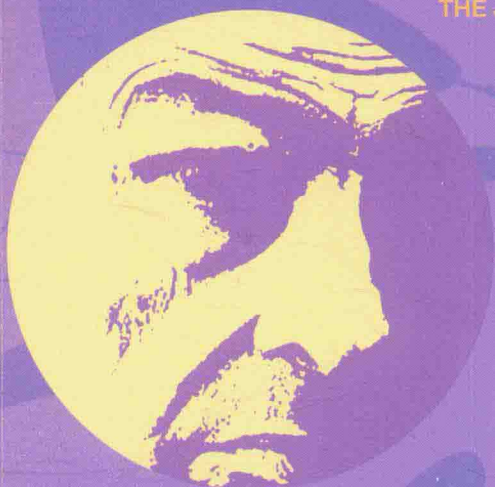
跨文化传播译丛

主编 吴 飞

Rodney Benson Erik Neveu

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布尔迪厄与 新闻场域

[美] 罗德尼·本森 [法] 艾瑞克·内维尔 主编

张 斌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跨文化传播译丛

Rodney Benson Erik Neveu

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布尔迪厄与 新闻场域

[美] 罗德尼·本森 [法] 艾瑞克·内维尔 主编
张 斌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尔迪厄与新闻场域 / (美) 罗德尼·本森, (法) 艾瑞克·内维尔主编; 张斌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3

(跨文化传播译丛)

书名原文: Bourdieu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ISBN 978-7-308-16651-5

I. ①布… II. ①罗… ②艾… ③张… III. ①新闻学—传播学—研究 IV. ①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6916号

布尔迪厄与新闻场域

[美] 罗德尼·本森 [法] 艾瑞克·内维尔 主编 张斌 译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何啸锋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64千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651-5

定 价 6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布尔迪厄与新闻场域

跨文化传播译丛

浙江大学“985”三期创新平台“浙江省一流学科计划——新闻传播学”资助
出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际传播的理论、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项目编号 09ZJD0010）

译丛编委会（以姓氏笔画排序）

主 编 吴 飞

编委会成员

韦 路（浙江大学教授）

李红涛（浙江大学副教授）

杨国斌（宾夕法尼亚大学副教授）

张国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吴 飞（浙江大学教授）

单 波（武汉大学教授）

姜 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赵晶晶（浙江大学教授）

郭建斌（云南大学教授）

展 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潘忠党（威斯康星大学教授）



启真馆出品

总 序

1648年以前的世界，不过是一个个隔离的孤岛，虽然出现过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及中国等四大古代文明体系，但这几大文明基本上只有地域性影响力，全球性秩序还没有成为表征那个时代的重要概念。欧洲三十年战争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把王权和神权的边界确定下来，承认国家主权不可随意被剥夺，欧洲文明开始了全球性扩张，主权国家的概念也影响到世界格局的确立，全球性秩序逐渐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近几百年来，一直是欧洲文明主导着世界秩序。不过海湾战争后，特别是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两极格局的结束变成了美国一家独大的世界格局，这个阶段世界秩序出现了一个新的特征，那就是人权、民主等普世原则等成为超越主权的新的游戏规则，成为美国强势在全球施展影响力的主要工具。当然，最近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动作多少从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和美国近几年单方面行动的作为中获得了一些灵感。尽管第68届联合国大会2014年3月27日投票通过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决议，申明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同时敦促各方通过直接政治对话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但俄罗斯置联合国决议不顾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因为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大会决议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有所不同：前者具有政治影响力，但没有法律约束力；后者具有强制性，相关国家必须接受并履行。

尽管金砖国家在迅速崛起，但当今的世界格局，仍然是美国一家独大。美国除了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强势影响外，美国还借助其先进的传播交流技术（尤其是交通与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主宰着全球的经济、

消费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认为，无论是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都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美国主导的经济、文化与政治游戏规则成为这个世界的不二法则。

网络社会的兴起、跨境物质的流动、全球各地区间人类生活方式的互相连接使得“社会”这一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符号和人都很复杂、易变，产生了一种由“社会化”到“信息”“传播”的转变。¹安娜贝拉·斯瑞伯尼（Annabelle Sreberny, 2000）曾指出，“当代修辞学主张，我们生活在一个单一的世界里，在其中，事件与空间均已消亡，距离的体验已不复存在”²。诚然，随着海底电缆、卫星电视、移动电话以及互联网的出现，国际电信使得时空逐渐消亡，让全世界的人际关系获得自身的即刻性和内在性。全球信息传播重新界定了全球和地方的物理界限，厘定了时间的线性进程，这些都不再虚幻。³

新兴的媒介技术和通信手段，尤其是因特网，让人们产生了错觉，以为重构时间与空间是20世纪90年代的现象。麦克卢汉观察到，空间消亡而时间成为关注的中心是电子时代的决定性结果。但事实上，传播权力并没有因为传媒技术的进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不少学者的研究便表明，全球数字鸿沟仍然存在，在线信息往往以欧美国家为中心，国家信息流，仍然是从发达国家流向非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生产的文化产品、娱乐产品，仍然主导着全球文化消费市场。但正因为美国的强势地位，让许多人开始反思“西方是最好的”这一观点存在的问题，包括法国、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更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等金砖大国，重新评估自己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一股去西

1 Lash, S., Urry J., *Economies of Sign and Space*, London: Sage, 1994; Castells, Mannel,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1996.

2 Sreberny, Annabelle,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In James Curran and Michael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3rd edition (93-119). London: Arnold, 2000.

3 Appadurai, A.,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Bass, A.,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to J. Derrida. In Writing and difference*, ix-xx.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方化、“脱美”的风潮正席卷全球，“欧洲中心论”、“冲击—反应”、“传统与现代”等传统模式无一不再受到更广泛、更严厉的挑战。

与世界权力格局向东转移的同时，重建国际信息新秩序也得到自觉民族和国家的普遍认同。问题是，世界权力的转移是否会导致新的国际冲突？世界和平的理想，是否能够从中国、印度这样的传统文明中获得新的营养？未来的国家实力，如何在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找到一种良性的平衡？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真的是世界潜在的规律？

笔者认为，影响世界和平最关键的因素是资源稀缺所导致的利益之争，但与此同时，那种“你们”与“我们”、“东方”与“西方”之类的二元思考框架，也影响着人们无法超越自我格局的思维定式。这种“你们”与“我们”、“西方”与“东方”的区隔，不仅表现在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之中，也表现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等方面。从“黄祸论”到“中国威胁论”、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到布热津斯基的“全球权力危机论”、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到保罗·肯尼迪的“美国的衰落论”，都能够发现“西方”与“非西方”、“我们”与“他们”的实质性区别。诚如保罗·柯文所言：“美国人在处于逆境时，依然可能在感情的最深处不由自主地回到那种经过夸大的‘我们’与‘他们’的两分法思想中去，认为‘我们’代表‘文明’，‘他们’则代表文明的对立面。”¹这种思维定式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对于他者的想象，误解、误读与认知偏见在所难免。民族国家间、宗教信仰间，乃至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间之隔离与冲突盖与此有着密切勾连。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交往频度、广度和交往技术都较以往有着根本区别。因此笔者认为，人类社会唯有完善“与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东”/“西”的二元思维定式，方能化解文明之冲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²

历史上从来不乏智者对此进行深入思考。芝加哥大学的谢尔登·波

1 [美] 保罗·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9页。

2 吴飞：“与他人共在：超越‘我们’/‘你们’的二元思维”，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10期。

拉克 (Sheldon Pollock) 教授曾出版过一本专门论述世界主义精神的著作, 名叫《世界主义》。在该书中, 他专门讨论了印度的世界主义精神, 以及这种精神与欧洲历史上出现的世界主义精神之间的差异。与世界主义对等的概念——“天下”, 同样见之于中华文明。它的确隐含了“世界主义”的含义。“天下主义”与西方的“世界主义”尽管存在差异, 但它仍可以看作是古希腊“世界主义”的对应词 (杰拉德·德兰迪、郭忠华, 2011)。¹在西方, 随着希腊城邦扩张到波斯, 然后又到印度, 四海为家的世界主义思想便自然而然萌生了。古希腊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第欧根尼声称“我是一个世界公民”, 第一次清楚地表达出世界主义最初的理念之一就是追求个人自由。而智者学派的安提丰 (Antiphon) 的雅典思想家就“以毫不含糊的词语断言, 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 并谴责贵贱之分和希腊人野蛮人之分”, 他的见解“表述了一种坚定的世界主义”。²之后斯多葛派的哲学家们认为, 世界主义是一种普世观念, 反映了人类成员间亲密而安全的关系, 就其本身而言, 它不是一种个人的自由行为。斯多葛派批评了古希腊人思想中将政治团体局限于城邦的倾向。芝诺 (Zeno) 认为, 一个理想的世界城市应建立在一个囊括更广泛的人类社会成员的基础之上, 他强调政治责任来源于强烈的主观情感。公民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 即国家应当是一个世界国家的想法, 形成了罗马人和基督教思想的世界普救说的基本观点, 给当代社会展现了一种超越我们现在所属的人类社会的景象。

1772年, 法国著名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在他的《关于波兰政府的思考》一书中, 预见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新时代里, 再没有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之分, 而只有一种人的存在——欧洲人。他们有共同的品味、一样的激情以及相同的生活方式。1784年康德发表了《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观念》, 宣称历史正在趋向于

1 [英]杰拉德·德兰迪、郭忠华:“‘世界主义’共同体如何形成——关于重大社会变迁问题的对话”,载《学术月刊》2011年第7期。

2 [德]E.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页。

缔造一个世界主义共和政体的秩序，而这一秩序将取代由民族共和国组成的世界。1795年9月29日71岁的康德写下了著名的《永久和平论》一文¹，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提出了法律层面上的世界主义（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世界主义宪法），开创了世界主义政治哲学，再次将世界主义推到学术前台。不过，尽管世界主义的思想无论在自由主义者还是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都可以找到知音，但在理论和实践上却很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

直到“冷战”之后，随着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信息技术革命、全球化和移民运动，以及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全球公民社会的壮大和全球治理的发展，世界主义的理念也得到广泛的复兴和发展。人们发现，国家不再是国际体系中的唯一行动者，尽管它仍然是最重要的行动者。相反，在处理全球公民社会的事务中，国家已越来越力不从心，各种跨国组织和国际协议（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APEC、G20、奥委会、绿色和平组织等）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²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恐怖分子、买卖武器者、洗钱者、贩毒者、拐卖妇女儿童者和知识产权的现代抢夺者都是通过全球网络运作的。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官员——警方调查员、金融监管者，甚至法官和立法者——越来越在全球范围的网络上交换信息和协调行动以打击全球犯罪，解决共同的难题。³尽管正在形成的全球公民社会是否能组成一个世界之城仍不确定，但它的确为建立一种新的世界主义奠定了基础。

当然“世界主义”不过是众多关于国际新秩序思考的一种向度，其他诸如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文明冲突论、天下体系、依附理论、文化帝国主义、软实力论等，都各领风骚，在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中占有一席之地。

1 [德]康德：《永久和平论》，何兆武译，载于《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97—144页。

2 参见[英]罗兰·罗伯逊、[英]扬·阿特·肖尔特、王宁等主编：《全球化百科全书》，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3 [美]斯劳特：《世界新秩序》，任晓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近几年中国一直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明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其基本内容是：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但这种新秩序的建立，注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总之，进入 21 世纪以来，地球虽然还是那个世界地球，但全球秩序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全球化、新媒体技术、软实力、符号资本等成为传播学研究者最为关切的核心概念。而随着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经济上取得巨大发展，GDP 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作为世界重要成员的国家身份认同变得异常强烈，中国领导人顺势提出了中国梦旗帜，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努力重构自己大国形象并谋求在世界格局中的有利地位。因此重构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国家形象就变成当下最热闹的研究课题。但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如何清晰地表达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同时又如何向国人说明“中国梦”以求形成整合力量，仍然是相当复杂而艰难的工作。

为此，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组织翻译了这套丛书。这些著作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全球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对中国学界、政界，甚至是商业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丛书的译者，大多有较长时间的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学习经历，数位译者在海外工作，这确保了翻译的质量有一定的保证。浙江大学出版社有一支优秀的出版编辑队伍，他们辛苦的劳动和认真细致的工作，使这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特此致谢！

吴 飞

2014 年 3 月 28 日

中译本序言

《布尔迪厄与新闻场域》一书首版至今已近 10 年。该书完成了它声称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向英语世界的媒介研究者、学生、记者以及其他对此感兴趣的公众引介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在初版导论中，我们曾说过，我们的目的不是强加一种研究教条，而是要激发论争，不但要“和”布尔迪厄一起思考，更要“反对”与“超越”布尔迪厄。我们很高兴得到这样的反馈。

很明显，布尔迪厄分析新闻业和其他文化生产领域的独特理论框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学者和新闻记者们的共鸣。《布尔迪厄与新闻场域》一书被广泛评论，数以百计的论文和书籍引用该书，很多课程使用该书，另外博客上也有大量关于该书的讨论。对无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博士生而言，该书提供了布尔迪厄社会学的入门路径，同时也激发了许多资深学者的深入思考。这样，该书为研究我们这个日渐饱和的媒介社会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并激发了一系列相关研究。^[1]而我们也在此后的研究中，以自己的方式去进一步阐发以及批判布尔迪厄的场域

[1] 除了在《布尔迪厄与新闻场域》一书中已经出现的作者，我们在这里指的是其他一些作者英文著作和文章，他们包括 Jan Fredrik Hovden, Orayb Najjar, Ida (Schultz) Willig, Nick Couldry, Aeron Davis, Stephen Reese, Piers Robinson, David Hesmondhalgh, Tom Medvetz, Giseline Kuipers, Adrienne Russell, Tim Vos, Stephanie Craft, Thomas Hanitzsch, Ron Jacobs, Eleanor Townsley, and Angela Phillips; and French-language scholarship by Olivier Baisnée, Julie Sedel, Vincent Goulet, Jérôme Berthaut, Eugénie Saitta, Sandra Vera Zambrano, Benjamin Ferron, and Aurélie Pinto. 如果我们没有指出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语种的文本，那只是因为我们的语言限制。

理论。^[2]

从一开始，我们编写这本书的目标受众就是国际读者。尽管该书主要提供的是法国和美国的比较研究，但欧洲的学者，事实上其他地区的学者也很快找到了与他们关注的自己国家和地区的议题之间的联系。我们很高兴《布尔迪厄与新闻场域》的中文版现在要在中国出版。张斌博士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创造性地完成了这一重要的工作，对此我们深表感谢。

场域理论真的可以“旅行”到中国吗？我们相信可以。场域理论是一种包容性模式，它追求一种普遍有效性。如同布尔迪厄在他那本具有突破意义的书《区隔》被译成英文时坚持的那样：

在我看来，经济和社会条件的世界与在此提出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模式的有效性是超越我所研究的特定法国个案的——这一模式的基础是对马克斯·韦伯提出的阶级和[地位]之间对立模式的重新思考。虽然毫无疑问，对任何一个分层社会而言，表达或展现经济与社会差异的区隔特征的体系……从一个时期和一个社会到其他时期和其他社会都会发生重大的改变。^[3]

在研究新闻业时，场域理论提供了一个可以在多元层次上分析新闻实践的普遍框架：新闻业的社会位置与国家、市场和其他文化生产场域（文学、科学、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新闻机构中工作的新闻

[2] 参见 e.g., Erik Neveu, “Pierre Bourdieu: Sociologist of media, or sociologist for media scholars”, *Journalism Studies* 8, 2 (2007): 335-347; Rodney Benson, “News Media as a ‘Journalistic Field’: What Bourdieu adds to New Institutionalism, and Vice Versa”,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3, 2 (2006): 187-202, 以及 *Shaping Immigration News: A French-American Compari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3]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xi-xii. 关于布尔迪厄对场域理论在国际范围内的挑战和价值，参见他的文章 “Social Space and Symbolic Space” in *Practical Reason: On the Theory of Ac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13.

记者所分享或竞争的专业实践的逻辑；贯穿在不同媒介和新闻报道与他们受众间的有等级的组织性差异。^[4]

换句话说，这里普遍的不是任何特定的实践（比如美国或法国的新闻模式），而是对分析任何特定国家、地区或跨国语境下的多层次社会结构和文化实践之间复杂关系的一种启示。与政治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学派不同，场域理论关注的不仅是形塑整体新闻业的同一性力量，而且也关注与不同媒介的社会分层相联系的各种变量。它提倡既要关注经济资本，也要关注持续进行的关于声望和合法性等象征资本的斗争。

对布尔迪厄来说，所有这些都是不断进行的反思中展开的。研究者一定要总是能确保自己不将先入之见强加到研究对象身上，不管这先入之见是根植于个人成长经历、民族文化，抑或是职业规范。这一告诫让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视野对于那些非西方的研究而言也是非常适用的。

这一理论框架怎样才能运用到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中呢？我们很犹豫，不知是否要对这一快速变化的空间给出太多特定的参考。但是，中国新闻业的重要发展可以通过场域理论的概念工具加以阐明，这一点非常清楚。我们只是注意到一些可能会在“场域”这一概念中遇到的研究问题。

与那些认为媒介是与国家或市场相分离的绝对“自由”领域的研究不同，场域路径强调那些正在进行的为了从国家或市场的限制中获得一定程度自主的斗争。因此，西方新闻业和中国新闻业的不同也不应该从绝对的角度，而要从相对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对在国家和地区的层面上，以及在两者相互交织的层面上理解政治、市场和媒介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言，中国是一道特别困难的难题。

场域理论也关注新闻记者（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比如博客）拓展批判性自主空间的不同路径，无论是政治性的，还是更加宽泛的智

[4] 关于场域位置、逻辑和结构的讨论的详尽内容，见 *Shaping Immigration News*, pp. 23-27.

识性的或创意性的。在不同媒介中〔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南方周末》、《财经》，以及正在蓬勃发展（或者是被大力压制）的独立博客〕的调查性报道和评论背后，其政治、商业和社会（阶级）的境况是什么？

虽然政治经济学分析已经正确地将注意力放在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相互交织上，然而场域理论也强调逐渐在分层化的相似性环路中（如同视中国社会为一个整体）运作的媒介生产和接受的方式。^[5]

不仅中国可能会从场域理论所生成的洞察视野中获益，我们也可能会很快增添关于场域理论的认识，因为它可能会在中国运用的过程中被细化和扩展。对布尔迪厄来说，理论从来都不是僵化的教条，或者是被锁在展示橱窗厚厚玻璃之后的东西。理论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是被使用而不是用来炫耀的概念。如果我们看一下他的许多著作的注释，就会很好地了解布尔迪厄对其他研究的兴趣，以及他用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改进场域理论的深度与广度。潘忠党（引用布尔迪厄）曾说，中国案例会给国际研究社群的“社会知识库”增添新的东西，这一点我们非常赞同。^[6]这样，我们就会有新的经验问题，它能够检测现存的理论和生成新的理论。

我们还不能充分预言场域理论和中国的媒介研究相遇之后将会修正或者扩展这一范式的方式，但我们能肯定的是，《布尔迪厄与新闻场域》这一重要和及时的翻译会对此提供支持。我们只能从提出问题开始，这些问题对中国和对其他国家都是相同的：在何种程度和何种方式上政

[5] 见“Cultural Capital, the State,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1949-1996”,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51, 1 (2008): 201-227, 吴愈晓证实了“文化大革命”后的教育分层，同时也用中国的案例挑战了西方学者关于文化资本的理论。他也展示了国家政策（在毛泽东时代通过阶级选拔学生）可以并且事实上改变了文化资本对儿童教育的影响。

[6] 见 p. 518 in Zhongdang Pan, “Articulation and Re-articulation: Agendas for Understanding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 (2010): 517-530, and p. 21 in Pierre Bourdieu, “For a scholarship with commitment”, in *Figuring back: 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 2, pp. 17-25, New York: New Press.

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形式是对立或联盟的？在何种程度和何种方式上新闻记者的实践（正式或非正式的）会折射出在持续寻求自主过程中的外部压力？在何种程度和何种方式上生产和消费新闻内容的多元方式与植根于阶级、教育、职业、地区或其他类别的社会分层平行或相似？我们热切地等待答案。我们只知道无论答案是什么，对于中国而言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将会为场域理论和比较研究的发展带来重要的启示。

罗德尼·本森

艾瑞克·内维尔

2014年7月

致 谢

在策划、写作和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有很多争论，当然绝大多数都和布尔迪厄有关。布尔迪厄（Bourdieu）本人对于向美国学者介绍他在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CSE）的新闻学研究团队（这为目前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有着很大的兴趣。1998年，他热心地支持我们出版一本关于新闻场域的英文文集。在他逝世两年后，他的创造性的启迪和热情的鼓励依然让人深深怀念。

1999年春天，艾瑞克·达拉斯（Eric Darras）牵头组织向法国-伯克利基金申请研究项目，对推动这一计划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计划将法国和美国的研究新闻媒体和政治之间关系当前转型的社会学者集中在一起。我们的申请得到了批准。2000年5月，我们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了一次学术会议，这为集体讨论场域理论和媒介研究的关系提供了第一次机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文化、组织和政治中心的主任尼尔·弗雷格斯坦（Neil Fligstein）和法国社会学研究中心的主任雷米·勒努瓦（Rémi Lenoir）联合主持了这次会议。除了本文集的作者之外，蒂莫西·E. 库克（Timothy E. Cook）、托马斯·C. 莱昂纳多（Thomas C. Leonard）和西奥多·L. 格拉瑟（Theodore L. Glasser）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2001—2003年间，在经过大量电子邮件交流，以及在巴黎和雷恩的多次会面之后，我们仔细斟酌敲定了本书的主题和结构。另外一些临时的讨论也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帮助我们坚定了信心，如在巴黎和帕特里克·尚帕涅（Patrick Champagne）以及CSE的同事，在图卢兹与艾瑞克·达拉斯，在圣地亚哥和丹尼尔·哈林（Dan Hallin）与迈克尔·舒德